

属辞比事与疏通知远

——由《史传通说》看美国学者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新思维

崔存明

(北京印刷学院 社会科学部 北京 102600)

摘要:《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以《文心雕龙·史传篇》为基础,分立二十四个专题,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融通中外,参验古今”,对中西史学的诸多重大问题分别加以梳理、比较,使中西史学于比较中显示出各自的发展脉络与体系,同时也以不言之教的中国式学术方式形成了独特的中西史学比较方法。同美国近50年来中西史学比较取得的成就主要在于比较方法的演进相对比,《史传通说》所蕴涵的中西史学比较的学术思想意义在于转向对新史学思想产生方法的追求,这是美国学者关于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在“中心论”和“异同论”以外的又一新思维。

关键词:中西史学比较;《史传通说》;中心论;异同论;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3-0141-04

南朝梁代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著作,以文辞瑰丽,体大精深,剖析文章利弊精确得当,而成为文学批评之宗。张之洞在《轺轩语》中,把《文心雕龙》与钟荣的《诗品》并列为“诗文之门径”,同时又称:“《文心雕龙》,操觚家之圭臬也”[1](326页),足见其对该书的评价之高。刘勰是一个文学理论家,同时其理论思维亦及于史学,因而《文心雕龙》有《史传》篇,专门评述了先秦两汉至魏晋时期的历史著作,评论史事,探究史理,提出自己的史学理论。这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篇史学评论专篇,同时也是达到相当高的学术水平的史学理论著作,故有学者称其“若隐现刘子玄《史通》之缩影”[2](3页)。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汪荣祖教授所著《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以下简称《通说》)以《文心雕龙·史传篇》为基础,分立二十四个专题,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融通中外,参验古今”[3](《史

传通说·史任第二十四》),对中西史学的诸多重大问题分别加以梳理爬抉,然后加以比较参验,使中西史学于比较中显示出各自的发展脉络与体系,从而使二者的比较建立在各自独立的体系基础上,然后再论其异同,究其长短,观其会通,避免了游谈空疏之弊。这正是本书在中西史学比较,亦或范围扩大到中西比较方面,所体现出的与众不同之新境界。

“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中西文明系焉。平心比较两者,论其异同,究其短长,为当今学术之大工作。以宽广之胸襟,会通两者,取其折衷,则世界性新史学所从出之途径。”[2](3页)这是中西史学比较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在具体的中西史学比较工作中,则出现了不同的治学途径与方法。我们之所以说《通说》在中西比较上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新境界,是在于把其置于当前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学术前沿加以定位与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通观《通说》全书,其言“中西史学之比较”,并没

收稿日期:2004-11-17

作者简介:崔存明(1970—),男,辽宁大连人,北京印刷学院社科部讲师,历史学硕士。

有说明具体以什么样的理论与方法来“比较”，这恰是本书隐含有自己独立的治比较史学方法之所在，也恰恰是本书的成就与价值所在。那就是，本书并没有落近世以来学术进展多以提出新方法为成就之窠臼，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远绍中国学术“述而不作”之精益传统，将真知灼见寓于实事求是之具体过程中，因而其“述”既成而其学说亦“作”。

因此，解读本书，可以分二个层次。

其一，掌握本书叙述之学术事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西史学之体系。

《通说》以《文心雕龙·史传篇》为基础，分立二十四专题，包括：载籍、记事记言、彰善瘅恶、春秋、左传、战国策、太史公、传记、班固、后汉诸史、陈寿、晋代之书、百氏千载、盛衰、石室金匱、铨评、总会、铨配、信史、记编同时、素心、直笔、贯通、史任等。这二十四专题的命名直接来源于《文心雕龙·史传篇》的原文，以一种类似于“关键词”的方式，选取了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史学各个不同领域的关键词，分而述之，则中国传统史学的各学术领域诸如史书体裁、史学名家、史著名篇、史学精神、史学传统、史学功能、史学理论、史家的职责等等皆加以专门研究，探赜索隐，使传统史学的各专门领域之知识脉络历历在目，明白晓畅。又以此为线索，合而观之，则此二十四专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的主题贯穿之下，又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史学发展史。这正是本书对中国传统学术所谓无形之形、无体之体的微言大义精神的继承与应用，此处暂不论这种中国式学术传统之得失，仅就其不轻言体系、划定框架这一点来看，实是中国传统学术具有无限发展之可能的一个重要的富有先进性的前提条件。这也是中国学术一个值得肯定的优良传统。《通说》一书所体现出来的著作精神，恰与此优良传统暗合，岂不是对中国学术真髓之把握所在？

作为以中国学术为基础的史学工作者，以中国学术特有的传统学术术语为媒介整理阐述中国史学之体系是其史命与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本书作者作为一个以中西史学工作为已任者，其努力远不止于此，其还肩负会通中西、以窥“世界性新史学所从出之途径”[2](3页)的远大使命。所以，《通说》在具体的行文之中，旁征博引，每一专题皆纳入中西史学的大视野中加以对比参验。在每一具体问

题的讨论中，都尽可能将西方史学相关之材料搜罗毕尽，并详加注释，说明出处，而“可发深思之译文，附录原文，以资参照”[4](1页)。这既体现了作者学贯中西的深厚学术功底，又反映出其严谨规范的治学态度。这些相关的西方史学材料在其所说明对证的中国史学专题的体系下，也相对地形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西方史学发展史，同中国史学发展史的形成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中西方史料共同说明每一个问题时，作者的工作重点在讲清楚各自“是什么”，而不轻下断言，必要时，只以简明之寥寥数语概括之。这样得出之结论，基础厚重，少有歧义，这亦是本书优点之所在。

《通说》的这种以中国传统学术话语论述学术问题的方法特点，我们可以用《礼记·经解》言“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来概括其排比中西史料、而成通说中西史学之基础的方法。《礼记集说》释“属辞比事”云：“属辞者，连属其辞，以月系年，以日系月，以事系日也。比事者，比次列国之事而书之也。”[5](1255页)。

其二，在掌握了本书所叙述的基本学术内容之后，可以进一步得出其运思谋篇与行文架构之特点，从而总结归纳出其未发于言表之中西比较方法，这样就使本书在中西比较学上的重要意义得以体现出来，始见其述而后作之学说梗概的所在。

中国学术历来有无用之用、不言之教的传统。这一特点的可肯定之处已如前揭。《通说》在立言宗旨上，多有受此传统影响之倾向。因此其著述更注重于要达到的学术目的，而不注重于具体方法的介绍，因为所谓方法即在行文结构之过程中。所以《通说》一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寓具体之比较方法于求学术之真旨之过程中。如果要对这一过程加以动态描述的话，我们仍不妨同样用其一以贯之的中国学术话语概括为《礼记·经解》中的另一句话：“疏通知远，书教也”。其意为：“疏通，谓能达于政事；知远，言能知帝王之事也”[5](1255页)。不过用以说明《通说》一书的宗旨，则可重新发挥成：达于史事，知历史发展之前途。这样，就可以准确说明《通说》鹄的之所在。

《通说》着力于属辞比事，于排比中西史料过程中作扎实的史家功夫，而刻意于某一具体方法，惟其不刻意于方法，而直接面向于解决问题，则形成了对中西比较方法的超越。

其一,属辞比事对“中心论”的超越。

所谓“中心论”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以其中的一方为中心,对另一方进行对比和价值判断。其思想“源于柏拉图,明确于基督教教义,经18世纪唯理学派论证,而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6]。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欧洲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而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不前的落后状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的一些变化则是由西方文明的冲击引起的。这就是所谓“欧洲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近二三十年,在美国和日本兴起了一种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思潮。198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柯文(Paul A. Cohen)教授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1984)[7],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主张”,形成了一个与“欧洲中心论”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两种思潮,使中心论的两个极端在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完全的展示。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心论”,无论是“中国中心论”还是“欧洲中心论”都作出了深入地分析和反思。事实证明,以任何一种文化为中心,都是预先设定了一个既有的价值标准,因而其求得之结果,只能是被现有思想发展进程的某一方面的统一,或言同化。而文化的统一或同化,并不是文化的发展。

《通说》却以属辞比事的方式,超越了中心论的模式,在具体的对比中完成了中西文化各自体系的排比与形成过程,从而为二者的会通与融合打下基础。在此基础上,所引伸出来的结论必将是超越二者的新的文化成果。

其二,疏通知远对“异同论”的超越。

近年来,在对“中心论”反思的基础上,美国学者中西史学比较上逐渐形成了代替它的“异同论”。认为只有既比较两者的‘异’,又比较两者的‘同’,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通过互为主体,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8]。这是国内学者对“异同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王国斌的著作[9]的评价之一,从

作评者的题目称其为“新思维”,足见其对这一理论的推重。同时,有学者把这一方法概括为“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研究方法[10]。这一方法,给出了中西比较的新思路,是当前中西比较方法较为公认的前沿。这也代表了20世纪以来,美国学者在中西史学比较方法方面所经历了几个转折后而达到的新高度,概括地说,“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五十余年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转向了‘中国中心观’;二是从‘中国中心观’转向了‘时空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前者以柯文为代表,探讨了中国史研究中以何者为参照系的问题;后者以王国斌为代表,探讨了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如何比较的问题。”[11]说明近五十年美国学者在中西史学比较方面筚路蓝缕,几经曲折取得了当前的成就,对这一总结进一步加以哲学概括,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卓有成效的努力都在完成着一个共同的探索——求得中西史学比较方法的改进,从“中心论”到以“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研究方法为标志的“异同论”,方法论已经达到了足够的高度。而《通说》所体现出的疏通知远的特点,同“中心论”与“异同论”相比,则更加明确地给出了中西比较的方向:求得新的世界性新史学所从出之途径。换言之,《通说》所蕴涵的中西史学比较的学术思想之意义同其他美国学者的探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前者是比较方法的不断演进,是方法论的探索;而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转向对新史学思想产生方法的追求,是对学术终极目标实现的接近,是价值实现的探求,使中西史学比较完成了对具体方法的超越,而朝向求得新思想之产生而努力的新思维。但同“中心论”与“异同论”已广为人知相比,这一新思维尚未引起充分重视和讨论。

要之,《史传说》属辞比事,寓方法于内容;疏通知远,使中西史学比较作为新史学所从出之目标明确突出,在实证中促成了比较方法的超越,而引中西史学比较进入新境界。

参考文献:

- [1]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M].北京:三联书店,1998.
- [2]杜维运.史传说·序[A].史传说[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3]汪荣祖.史传说[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4]汪荣祖.史传说·凡例[A].史传说[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5]孙希旦. 礼记集说[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6]吴承明. 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3).
- [7]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8]吴承明. 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新思维[J]. 读书,1998,(12).
- [9]王国斌.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 [10]参见:李伯重. 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 [11]乔新华. 五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J]. 河北学刊,2004,(4).

American Scholars' New Thinking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History Study in the Light of Shi Zhuan Tong Shuo

CUI Chun-ming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Beijing Printing Institute, Daxing, Beijing 1026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western history comparison, Shi Zhuan Tong Shuo sorts out and compares many significant issues in Chinese-western history study, reveals in comparison the respective development and system of Chinese-western history study, and at the time forms a peculiar Chinese-western history comparative method in a Chinese academic way. Contrasted with the main achievement in comparative method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hinese-western history study in the recent 50 years, 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Chinese-western history comparison in Shi Zhuan Tong Shuo lies in the shift to the pursuit of new history study thinking methods, which is a new thinking of American scholars, other than “center theory” and “similarity-difference theory” in their comparative study.

Key words: Chinese-western history comparison; Shi Zhuan Tong Shuo; “center theory”; “similarity-difference theory”

[责任编辑:李大明]